



【人生随想】

麦秸垛往事

在“北大荒”插队的时候，我只留意过豆秸垛，没有怎么留意麦秸垛。

那时候，队上每家的房前屋后，最起码要堆上一个豆秸垛，很少见有麦秸垛。我们知青的食堂前面，左右要对称地堆上两个豆秸垛，高高的，高过房子，快赶上白杨树了。这些豆秸，要用整整一年，烧火做饭，烧炕取暖，都要靠它。

麦秸垛，一般是在马号、牛号旁，喂牲畜用，不会用它烧火做饭，因为麦秸没有豆秸经烧。往灶膛里塞满麦秸，一阵火苗过后，很快就烧干净了，只剩下一堆灰烬，徒有热情，没有耐力。

返城后很多年，看到了梵高的速写和莫奈的油画，有很多幅画，画的是麦秸垛，一堆堆，圆乎乎，胖墩墩，蹲在收割后的麦田里，闪烁着金子般的光。我这才发现麦秸垛其实挺漂亮的，只不过，当初忽略了它的存在。只顾着实用主义的烧火做饭、烧炕取暖，不懂得它还可以入画，成为审美的浪漫主义作品。

后来，看到文学作品，大概是铁凝的小说，她称麦秸垛是矗立在大地上的女人的乳房。这样的比喻，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尽管我在北大荒经历过好多年的麦收。但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比喻新鲜，充满乡土气息和人情味，让我忍不住想起当年在北大荒一望无际的麦田里弯腰挥舞镰刀的当地能干的妇女。

再后来，我看到聂绀弩先生的诗，他写的是北大荒的麦秸垛：“麦垛千堆又万堆，长城迤逦复迂回，散兵线上黄金满，金字塔边赤日辉。”他写得要昂扬多了，长城、黄金和金字塔，一连串的比喻，总觉得压在麦秸垛上，会让麦秸垛力不胜任。不过，也确实惭愧，当年在北大荒收麦子时，缺乏这样的想象力。

对于豆秸垛，我多少还是有些想象的，那时看它圆圆的顶、结实的底座，阳光照射下，一个高个子又挺拔的女人似的，丰乳肥臀，那么给人提气。当然，比起麦秸垛的金碧辉煌，豆秸垛灰头土脸的，像土拨鼠的皮毛。只有到了大雪覆盖的时候，我才会为它扬眉吐气，因为那时候，它像我儿时堆起的雪人。

用豆秸，是有讲究的。会用的，一般都是用“三股叉”从豆秸垛底下扒，扒下一层，上面的豆秸会自动地落下，填补到下面来，绝对不会自己从上面塌下来。在这一点上，麦秸垛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如果是麦秸垛，早就像一摊稀泥一样，坍塌得一塌糊涂，因为麦秸太滑，又没有豆秸枝权的相互勾连。所以，就算是经历了一冬一春，快烧完了，豆秸垛都会保持着原来那圆圆的顶子，就像冰雕融

化时那样，有些悲壮的样子，一点点地慢慢融化，最后，将自己的形象湿润而温暖地融化在空气中。

因此，垛豆秸垛和垛麦秸垛，完全是两回事。垛豆秸垛，在北大荒是一门本事，不亚于砌房子，得要手艺。一般我们知青能够跟着车去收割完豆子的地里，拉豆秸回来，但垛豆秸垛这活儿，都得等老农来干。在我看来，会垛它、会使用它的，都是富有艺术感的人。在质朴的艺术感方面，老农永远是上等的老师。

不能怪我偏心眼儿，我对豆秸垛充满感情。对于麦秸垛，我的心里有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尽管看过了梵高和莫奈的画，看过了铁凝的小说和聂绀弩的诗，对于麦秸垛，还是提不起足够的精神，不能用他们那种独有的审美眼光重新审视麦秸垛，然后，从容地迈过这道坎儿。

我怎么也忘不了，近五十年前，在北大荒的麦收时节，打夜班收麦子，一位北京女知青因为一连几夜没睡觉，太困了，倒在麦地的一个麦秸垛里睡着了。那时候，联合收割机在麦地里收好麦子，顺便就脱好粒。剩下的麦秸，就地垒成小小的麦秸垛，等天亮时，马车来拉走，拉到马号、牛号去，或者是麦收后一把火烧净。大概是怕着凉，那位女知青顺手在自己的身上盖了一层麦秸，一片金灿灿的麦秸在月光下闪着光。收割机开过来，准备拐弯去收割下一片麦田的时候，以为那真的是一個小小的麦秸垛，便开了过去，从她的腰间无情地轧了过去……

如今，我还常常想起农场那位躺在麦秸垛里被收割机轧伤腰的女知青。在那一群女知青当中，她长得很出众，高高的身条儿，秀气的面庞……如今，只要一想起麦秸垛，我的眼前就忍不住浮现出她青春时如花似玉的样子。

回北京这么多年，我只见过她一次。是个夏天的黄昏，她一个人扶着墙，艰难地向胡同口的公共厕所走去。夕阳拖长了她那蹒跚的身影。当时，我不敢招呼她，我怕引起她伤怀的往事。我的感受犹如万箭穿心，不知道她恨不恨那个麦秸垛，我是恨透了。

我知道，这是我的偏颇，麦秸垛是无辜的，只不过有我的感情在里面而伤感。即使我无法像梵高、莫奈、铁凝和聂绀弩一样，赋予麦秸垛那么多的诗情画意，但是，坦率地讲，北大荒的麦秸垛和豆秸垛，都让我无法忘怀，是它们让我看到了生活中的美好与艰辛，看到了青春如风、流年似水，成为我抹不去的回忆。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有一个人，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开始学习草书，他给自己定的任务是：一天只学一个字，也就是每天只记一个字的草书写法。正是这个人，后来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书法家之一，其成就主要在草书方面，世人尊称他为“草圣”。这人便是书法家于右任。

与少年成名的草书家不同的是，于右任致力于草书研习其实起步很晚。他在民国书坛，早年就与郑孝胥有“北于南郑”之称。他早年习帖学，后转入碑学，1930年的一首诗曾表达当时刻苦临习碑之勤苦：“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石门铭》《龙门二十品》是魏碑中的代表作品，他在正式学草书之前，早就用全副精力打下了楷书的基础。对几种主要书体，于右任打过这样一个比喻：“楷书如行步，行书如乘轮船、坐火车，草书就如乘飞机。”当时正值20世纪初期，他着眼于当时国际社会之加速发展，痛感于中华民族进步滞后的状况，极想在文化效率上做出贡献。他认为草书书写效率高，但世人苦于难识难记，于是起而倡制“标准草书”。接近50岁时，他开始着手搜集历代草书墨迹、拓本、论著以及敦煌、楼兰、居延等地新出土的简牍上的草书。这是他致力草书学习与研究、推广的第一步。他后来回忆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识草。”

1932年，于右任在上海成立“标准草书社”，与友人、弟子研讨切磋，制定出标准草书四原则：“易识，易写，准确，美丽。”接下来是如何推广的问题，于右任高屋建瓴，决定从前人的草书墨迹、碑刻中选取符合标准草书原则的字，编成《标准草书千字文》，向全社会推行。想要学习草书的人，通过临摹这个千字文版本可以掌握一千个字的草书写法。

与此同时，于右任对草书更重要的一个贡献，是提出并归纳、整理出草书的“代表符号”。有了这些草书符号，人们就可以像现代人用“五笔字型”电脑录入一样，很快地掌握与部首对应的草书符号，就可以在一定的规则之下写出规范、正确的草书了。

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早年从事反清活动，追随孙中山，后长

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同时是复旦大学等中国近现代著名高校的创办人。他以世称“于草”的厚重书风书写大量作品，遍流人间，但他生前写字从来不收钱，虽身为高官，却一生清贫，潜心从艺，廉洁从政，安贫乐道。这样的人品比现今无数书法名家都高了N倍不止。

于右任晚年病重时，遇到的最大问题竟是“没钱住院”。他最后一次住院时，问住病房一天需多少钱，如果太贵就出院回家。副官隐瞒实情，将每日高达千元的住院医疗费说成只有一百元，他才终于安心地住院。他想以自己月薪5000元新台币的收入，还是“住得起”的。然而，为时已晚，他的病已经治不好了。

对艺术，于右任一生痴心追求。当年轻人向他请教时，他从不故作高深，总用简单浅显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尽管推行“标准草书”的初衷是为提高社会的文化交流效率，但并非只着眼于实用，而照样有鲜明的艺术追求。对于学习草书，他有一句名言：“我们学草书，如不能成草圣，也应成草贤，千万不要成了草包。”

于右任先生对于求字的人来者不拒，而且不论身份、地位，几乎有求必应。在南京政府当官时，有人问他：“老人家每天写这么多字，难道不累？”于右任回答说：“写字是最好的运动，也是快乐的工作。人家求你的字，总是喜欢你的字，就写吧！”

1964年的一天，蒋经国前往看望于右任。当时，蒋介石的人事布局，已经笃定由蒋经国接班。在两岸关系问题上，许多“民国老人”对蒋经国寄托着希望。蒋经国求于老惠赐墨宝，于右任略作思索，挥笔写出一副对联：“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此14字，隐隐表达了天下之利是顺应国家、民族的大义，若求留名青史自应努力实现与大陆和平统一，方可得万世之名。蒋经国后来将这副对联精心装裱后挂在自己的办公室。

在台湾，于右任对大陆的怀念十分浓烈。他的《望大陆》一诗令人读之落泪：“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唯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本文作者为美术学博士、书法家)

【文化杂谈】

于右任为何一天只学一个字

□王谦